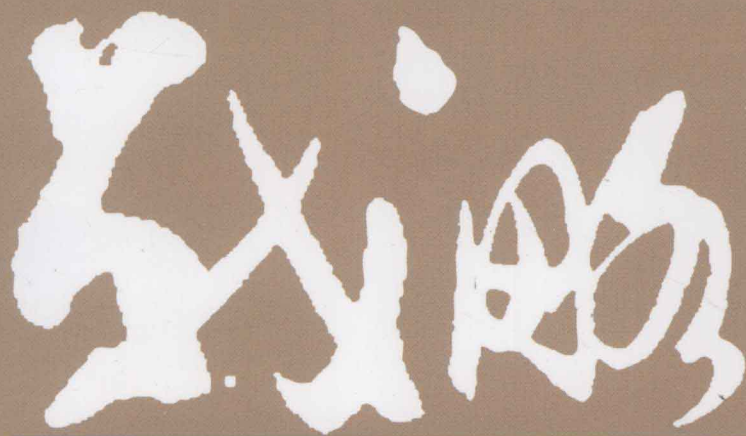




管理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以学术精神的名义

彭维刚 格雷戈里·G.戴斯

战略管理中的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述评

孙俊华 陈传明

基于过程视角的企业非市场战略与行为分析

邓新明 田志龙

异向组织变革的动因模型：基于军民

结合实地案例的研究

柏帅蛟 高遐 井润田

ISBN 978-7-5096-1320-7



9 787509 613207 >

1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管理/徐二明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096-1320-7

I. ①战… II. ①徐… III. ①企业管理: 战略管
理—文集 IV. ①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919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国强

责任印制: 木 易

责任校对: 陈 颖

880mm×1230mm/16

6.75 印张 191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书号: ISBN 978-7-5096-1320-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 100836

战略管理

Journa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第3卷 第1辑 2011年3月

Vol. 3 Issue 1 Mar., 2011

目 录

观 点

以学术精神的名义 彭维刚 格雷戈里·G.戴斯 (1)

研 究

战略管理中的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述评..... 孙俊华 陈传明 (21)
高层管理团队社会资本、组织学习和中小企业国际化..... 周小虎 贾苗苗 (29)
基于过程视角的企业非市场战略与行为分析..... 邓新明 田志龙 (37)
企业不当政治行为治理：中美制度对比与启示..... 高勇强 陈 磊 (47)
企业信息能力：对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 王京安 赵顺龙 (55)
技术变革引致企业战略演进 卢彬彬 罗仲伟 (61)

社会责任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 姜 超 苏 良 唐方方 (77)

案例研究

异向组织变革的动因模型：基于军民结合实地案例的研究 柏帅蛟 高 遐 井润田 (88)

会议纪要

2010年全国MBA培养院校《战略管理》师资培训研讨会会议纪要 (100)

Contents

Focus

- In the Spirit of Scholarship Mike W. Peng, Gregory•G. Dess (1)

Research

-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Firm Social Capital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 Sun Junhua, Chen Chuanming (21)
- TMT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 Zhou Xiaohu, Jia Miaomiao (29)
-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Non-market Action Based on Process Perspective
..... Deng Xinming, Tian Zhi long (37)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ino-US Governanc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Misconducts
..... Gao Yongqiang, Chen Lei (47)
- 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Firm: Development form 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Firm
..... Wang Jingan, Zhao Shunlong (55)
- Strategic Choice of Enterprise Resulted from Changes in Technology
..... Lu Binbin, Luo Zhongwei (61)

Social Responsibility

- The Study of China's SO₂ Emissions Rights Trading Mechanism
..... Jiang Chao, Su Liang, Tang Fangfang (77)

Case Study

- Driver Model of Divergent Organizational Change: Based on Field Studies of Military-civilian-integration
..... Bai Shuaijiao, Gao Xia, Jing Runtian (88)

Minutes

- The Minutes of 2010 National MBA Course "Strategic Management" Workshop (100)

【观点】

以学术精神的名义

彭维刚 格雷戈里·G.戴斯

(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 近来，管理学术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相关性；二是基于学术竞争而发表论文所产生的功能障碍。为了辩护管理学术的精神，我们提出两个论点：第一，批评管理学术有缺陷，是因为它的不相关性。这种批评本身就是不相关的，没有认识到学术的本质。管理学者们应该为我们的学术感到无比骄傲，而不是失去自信。正是这种学术促使现代商学院丢弃了1950年代那种高度“相关”但学术上濒临崩溃的“贸易学院”模式。第二，我们认为我们的学术竞争酷似奥运比赛，能够吸引整个人类。显然，获得奥运奖牌的能力（比如赛跑，滑冰，射击运动员）与现实世界没有多大联系。但重要的是，那种专注、训练和奉献代表了人类追求卓越的精神。我们在这里大力鼓吹与支持的学术精神也正是如此。

【关键词】 管理学术；相关性；学术竞争；管理学者

管理学术的本质是什么？^① 我们为什么要做研究？即将入学的或者一年级的博士生如果通过浏览我们主要学术期刊的文章，包括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AMLE)，来寻求管理学术的意义，他们会感到气馁或者（至少是轻微的）沮丧。我们的学术总是受到严重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①所谓的“不相关”与缺乏对实践的影响 (Bennis, O'Toole, 2005; Mintzberg, 2004; Pfeffer, 2007; Pfeffer, Fong, 2002, 2004)；②在“A”类期刊上所发表的研究是由学术竞争造成的，多是“废话” (Adler, Harzing, 2009)，“健忘” (Giacalone, 2009)，“迷信” (Hambrick, 2007)，“投机取巧” (Macdonald, Kam, 2007)。当七篇准备用来庆祝管理学会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 50 周年的文章最终全部被否定的时候，期刊当时的主编 Sara Rynes 感

【作者简介】 彭维刚 (Mike W. Peng, 华盛顿大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全球战略杰出首席讲座教授，电子邮箱：mikepeng@utdallas.edu。研究兴趣包括战略管理、国际商务、全球战略和新兴经济、研究重点是制度基础观。

格雷戈里·G.戴斯 (Gregory G. Dess, 华盛顿大学博士)：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安德鲁塞西尔应用伦理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战略管理，知识管理和创业。

本文由顾艺文、郑莹初译，任兵、阎大颖校对。徐二明在编辑过程中再做校对。译者感谢文章作者 Mike Peng 和 Gregory Dess 对翻译本文的支持；感谢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杂志主编 Ben Arbaugh 和美国管理学会沟通主任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Michael Davis 的支持与引导；感谢美国管理学会授权支持我们翻译，并发表此译文。顾艺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郑莹：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与战略，国际商务；任兵：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组织与战略；阎大颖：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公司金融。有关本翻译稿的宝贵意见或建议请联系任兵，E-mail: renbing@nankai.edu.cn；电话：86-22-23509167。对英文版感兴趣的读者请联系原文作者，达拉斯德州大学的 Mike Peng (mikepeng@utdallas.edu)，或 Gregory Dess (gdess@utdallas.edu)。本文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错误或疏漏，此责任译者担负，与原作者无关。另外，在这篇译文中，基于版面限制的考虑，我们省略了原文有关 UTD 的 top100 商学院研究排名的表 2。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参考该文的英文版。

① 韦氏在线字典将“学术”广义地定义为对“知识和学习的投入”。在这篇文章里，“管理学术”指的是由一般商学院（通常称为管理学院）为代表的在广义的管理学领域进行的学术研究，包括会计、财务、信息系统、营销和运营。换句话说，“管理学术”不仅意指由管理学会代表的知识领域。

叹道，“论坛上充满了悲观主义的风险”（2007）。作为学者，我们都用写作去影响他人，也都通过阅读受到别人的影响。即将入学的或一年级的博士生毫无经验，正在苦苦地思辨着他们所进入的世界（Mitchell, 2007; Tjosvold, 2008）。这些对学术本质上的批评，会对学生们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有没有人可以为我们学术说句公道话？

表 1 2000 年以来对管理学术的批评与辩护

批 评	辩 护
Pfeffer, Fong (2002)	March, Reed (2000)
Mintzberg (2004)	DeAngelo, DeAngelo
Pfeffer, Fong (2004)	Zimmerman (2005)
Bennis, O'Toole (2005)	Vermeulen (2007)
Ghoshal (2005)	AACSB (2008)
Hambrick (2007)	Knights (2008)
Macdonald, Kam (2007)	Mitra, Golder (2008)
Pfeffer (2007)	DeNisi (2009)
Shareef (2007)	Jain, Golosinski (2009)
Adler, Harzing (2009)	Kieser, Leiner (2009)
Giacalone (2009)	Lee (2009)
Podolny (2009)	Worrell (2009)
	O'Brien, Drnevich, Crook, Armstrong (In Press)

一、有没有人可以为我们学术说句公道话？

如表 1 所示，已有少数学者站出来，在 AMLE 中从实质到“游戏”，为管理学术进行辩护（Jain, Golosinski, 2009; Knights, 2008; O'Brien, Drnevich, Crook, Armstrong, In Press; Worrell, 2009），以及在其他地方辩护（AACSB, 2008; DeAngelo, DeAngelo, Zimmerman, 2005; DeNisi, 2009; Kieser, Leiner, 2009; Lee, 2009; March, Reed, 2000; Mitra, Golder, 2008; Vermeulen, 2007）。然而，相对于那些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来说，这些辩护则显得畏缩、迂回，并且明哲保身。例如，Adler 和 Harzing (2009) 批评道，学术评价系统工具建立在“A”类期刊“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因此，这个工具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面对这种批评，阿肯色大学沃尔顿商学院院长 Dan Worrell (2009) 回复说：“Adler 和 Harzing 夸大了问题的性质”——仅仅是“夸大”了吗？同样，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院长 Dipak Jain 也同意在认定优秀学术上存在着“设计上的挑战”（Jain, Golosinski, 2009）。然而，尽管现存系统仍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由于缺少可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标准，我们还是需要照旧玩这个游戏（Jain, Golosinski, 2009）。因此，这种辩护演变成为方法论层面的辩护，而不是哲学、历史、战略层面的辩护。

我们相信对学术会有更直接、更有效的支持与辩护。据此，我们有两个论点。

首先，作为学者，我们不需要对所谓的学术不相关性而感到羞愧。我们需要的是拥有信心，对我们的学术感到无比自豪。通过对知识的“神圣追求”，我们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引自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Susan Ashford 的观点。见 Walsh, Tushman, Kimberly, Starbuck, Ashford, 2007）。“二战”后商学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废除了 20 世纪 50 年代那种高度相关但学术上濒临崩溃的“贸易学院”的模式。正是我们理论缜密的学术把商学院推到新的顶点（Agarwal, Hoetker, 2007; Colquitt, Zapata-Phelan, 2007）。

其次，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加入这场游戏，力争上游，竭尽全力，聪明过人，而不是以较低

的工作满意和自我实现水平、不情愿地参加（或退出）这个学术竞争。奥林匹克竞赛就是激励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到底，奥林匹克竞赛与现实有什么相关性呢？具体讲，把篮球扔进离地 10 英尺的铁环中的能力与现实有什么相关性呢？在 100 米赛跑中，金牌获得者与银牌获得者之间 0.01 秒的差距会有什么重大的统计意义呢？但是，为什么全人类都为这些比赛着迷呢？显而易见，（赛跑、滑冰、射击等运动员）赢得奥运奖牌的能力与现实世界没有相关性。然而，我们仍旧认为，奥林匹克竞赛代表着人类苦苦追求卓越的精神。在追求学术精神上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要为学术精神而辩护，还要积极参与其中。^①

写这篇文章目的就是，我们根本不同意以下的批评：①我们的学术不具备相关性，这是有瑕疵的；②我们的学术竞争将重点放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不健全的。我们文章的目的是明确地阐述管理学术的本质，从而提升学术的精神。批评者对我们学术界中不尽如人意之处做了一些实证观察，对此，我们不予争论。但是，请允许我们提出与之不同的结论。我们也相信，我们代表着大多数沉默的学者们。他们在努力地工作着，忍受着大量论文被拒，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所遭遇的批评表示着极大不满。

思想与偏见共生共存。我们要陈述我们的观点。总之，我们在几所大学的教龄已有 45 年了。我们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也做过各种编辑工作。准确地说，我们是偏爱于学术。此外，我们也撰写了顶级的教科书，为实践者而出版，并从事高层主管的培训和咨询。为此，我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不相关”。

二、学术和相关性

你将会看到，这里所引用的观点可以追溯到 1909 年。为此，本节的内容并不新颖。显然，以前的学者已经碰过有关相关性的问题。然而，为了繁荣学术精神，“我们不得不反复地、经常地、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Rajan, Zingales, 2003）。

在众所周知的“象牙塔”里，根据定义，学者并不需要考虑相关性（Kieser, Leiner, 2009; March, Reed, 2000）。否则，他们就不是学者，而是实践者。我们再次强调：学者就是学者，学者不是实践者。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第一代学者出现在古代中国、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那时，食物生产充裕，有一定的剩余可以使有智慧的人从事非农业（不相关）的学术工作。在西方文明中，学者最早出现在经济繁荣时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在黑暗时代，学术研究的贡献削弱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饥饿、瘟疫的出现，使社会无法继续支持众多的学者。一步踏入我们的年代：战后全世界经济得到巨大发展，高等教育随之戏剧般地扩张，管理学术也在各个学科领域得到发展。换句话说，学者们得益于经济剩余，可以合理地从事大多数非学者们认为是“不相关”的智力工作。出于学术的不相关性而认为学术有缺陷的批评，其本身可能就是不相关的。这种批评反映出他们没有认识到学术的本质（Kieser, Leiner, 2009; March, Reed, 2000）。

接下来，我们非常清楚你的下一个问题：“什么是管理学术呢？商学院的学者们难道不应该致力于加强学术与实践的联系吗？”我们的答案：是的，我们应该为此努力。但是，如果我们学术的相关性不像我们中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也不必感到沮丧。探求相关性是可以理解的（Dess, Markoczy, 2008）。然而，事实说明，学者们“通过专注于基础研究，会创造最大价值”（AACSB, 2008；也可以参考 Baldrige, Floyd, Markoczy, 2004; March, Reed, 2000）。出色的学术可以提

^① 由于关于商学院行业的争辩本身已形成一个特有的产业，我们在此仅关注“研究”这一重要方面，而不涉及对其他领域的评价，比如媒体排名和 MBA 项目（参见 DeAngelo et al. [2005], Gioia and Corley [2002], Pfeffer and Fong [2002], and Mintzberg [2004]）。

高学校的声望，“使学校对优秀学生更具有吸引力，引来更多的、更合格的申请者”（Becker, Lindsay, Grizzle, 2003）。学校声誉很好，会使毕业生获得更高的收入。Mitra and Golder (2008) 提到，学院的教员一年发表 3 篇“A”类文章，会使 MBA 毕业生年起薪提高 750 美元。O'Brien 等发现，学校教员所做的学术研究与毕业生年薪有着更强的溢价关联：MBA 的年薪平均可以提高 24000 美金。就这点而言，所有对学校声望有贡献的研究，是与毕业生的收入具有相关性的。

人们常常提到，20 世纪 50 年代是商学院的转折点。那时，商学院废弃了高度“相关”的“贸易学院”模式，转向他们知识生产中更科学的模式（Khurana, 2007）。^①实际上，从商学院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追求科学学术的愿望了。1909 年，哈佛商学院（史上第二个商学院）成立一年后，建院院长 Edwin Gay 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

“我们相信在商业中具有科学。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和发展其中引人入胜的科学。”（引自 Khurana, 2007）

1967 年，Herbert Simon（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获得者）写道：

“如果商学院坚持院内所有的研究都直接与商务有关，就不可能招聘到一流的科学家。如果能够更好地表示出对基础研究的尊重，并允许至少有一部分教员所从事的研究与商务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话，商学院就会好得多……留住优秀科学家所要支付的代价，如果这叫做代价的话，就是他们某一部分的活动只产生优秀的理论，而不必与商务所关注的某个方面相关联”（Simon, 1967）。

大家都知道现代商学院的辉煌历史，为什么 Bennis 和 O'Toole (2005) 会对科学研究推动现代管理学术一事感到惊讶？商学院按照设计的要求变成现在的样子（Simon, 1967），而 Bennis 和 O'Toole (2005) 认为“罪名成立”。除了商学院把重点放在科学学术上以外，Bennis 和 O'Toole (2005) 以及 Pfeffer 和 Fong (2002) 还抱怨很多商学院的教员没有实践经验，并且建议商学院聘用一些有管理经验的教员。40 多年前，Simon (1967) 就在上面所引用的同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个问题：

“是什么动机使得一个人暂时或永久地离开了他的商业生涯，而到商学院任教呢？这样的人可能只担任着相对低的管理职位，对未来升迁也没有过分期望。而商学院却承诺给他财务与专业上的提升。当这个人做出这种跳槽的决定时，除非这时他很年轻，否则不可能在学术上做出比他在商务方面更出色的成绩来。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可能就快退休了。当然，没有证据，也没有经验证明，缺乏活力与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人会渴望在专业上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个人可能会进一步饱遭磨难，沉浸在做优秀的商务教学咨询师的幻想中，去‘告诉孩子们，我曾经是怎样做的’。”（Simon, 1967）

Simon (1967) 指出，当商学院试图聘用二等（或过景）的人担任教员时，会造成“无数的错误和平庸的成果”。1950 年代，商学院在聘用教师的战略上明显失败（DeAngelo et al., 2005），就促使商学院现在聘请最好、最聪明并以学术作为第一生涯的人作为教员。^②

那些在商学院任教却没有很多管理经验的学者们怎么办？不可否认，最初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焦虑。作为一年级博士生，年龄在 23~27 岁时，我们开始讲授教学编码为 400 级的本科生课程。这可是华盛顿大学排在前 15 名的本科商业教学项目。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经验是孤立的。通过研究，学者们如能迅速地并诚实地告诉自己，他们已经掌握了教学领域内的整体知识，他们就会在教学中变得更加自信，更有效率。抛开我们的个人经历不说，教育研究也证实了研究生产力与教

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可以从一个主要的商学院所教授的高度相关的课程中找到这样的例子：a. 烘焙原理：面包和面包圈；b. 烘焙原理：蛋糕和各种食品；c. 面包和面包圈制作：实际店铺运营（Khurana, 2007）。

② 当然，有些出色的管理学者也曾其他行业工作过。但是我们反对的是 Bennis 和 O'Toole (2005) 以及 Pfeffer 和 Fong (2002) 所提出的观点，即商学院是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聘用那种将学术作为第二（或最后）事业的人，而不惜以拒绝那些没有管理经验却将学术作为第一事业的学者为代价。

学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Morgeson, Nahrgang, 2008)。

针对 Bennis 和 O'Toole (2005)、Mintzberg (2004) 以及 Pfeffer 和 Fong (2002) 提出的观点, 即管理经验是否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学者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 Vermeulen (2007) 已经给出了最好 (也是最令人愉快的!) 的回答:

“我研究管理者就像动物学家研究山林里的大猩猩一样: 要了解它们, 但你自己并不必须成为一只大猩猩。同样, 你可以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犯罪学家而不需要曾刺伤过别人, 或者在商店偷过东西。” (Vermeulen, 2007)

Vermeulen 进一步建议管理学者与管理者进行交谈。用他自己的话, “我不时地强迫自己走进山林, 嗅一嗅野兽的味道” (Vermeulen, 2007)。他还建议花些时间, 为实践者们写一些文章。这些我们都做了, 当然也将这种战术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同事。

一个公平的问题是: “学者们是否应该从事高度相关的研究, 期刊又是否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Daft 和 Lewin (2008) 认为存在两种相关性: 学术相关和实践相关。让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实践相关上。Bennis 和 O'Toole (2005), Hambrick (2007), Mintzberg (2004), 以及 Pfeffer 和 Fong (2002, 2004) 为缺乏这一点而感到沮丧。两个顶级期刊的编辑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编辑部撰写的一篇纪念“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SQ) 50 周年的文章里, Donald Palmer (2006) 说, ASQ “没有发表那些旨在提高管理的和其他实践的文章”。同样, “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 OS) 的创刊编辑, Richard Daft 和 Arie Lewin (2008) 坦陈“对于 OS 来说, 直接的实践相关性是一种幼稚的想法”(1981), “从来没有实现过”(1977)。结果呢?“OS 不应该致力于发表与实践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知识”(Daft, Lewin, 2008)。相反, “OS 的基本使命有两点: 一是把重点放在持续扮演基本理念来源的角色; 二是发表与其他组织学者相关的科学知识。” (Daft, Lewin, 2008)

与实践相关的知识已经涌现 (AACSB, 2008; Baldrige et al., 2004)。但是, 有关这种知识怎样出现以影响实践的机制还是个谜。^① 特别是, “作为知识来源的作者和学术期刊并不确切知道已发表论文中的知识是如何被接收、被解读与被使用的。针对学术读者的基础研究有可能被实践者所接受……但是, 这种可能性是相当的低。” (Daft, Lewin, 2008)

既然在相关性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学者在写作学术论文、期刊在发表学术论文时, 如果特意考虑实践的高度相关性, 将会是 (非常可能是) 令人失望的。同时, 有些学者可能会惊喜地看到他们的研究具有意想不到的相关性, 受到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② 总之, 学者和期刊“最主要的使命应该是探索而不是利用” (Daft, Lewin, 2008)。我们的观点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一个领域, 追求一个与管理者相关且有帮助的长期目标没什么错误 (DeNisi, 2009)。但是, 如果我们在期刊上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像我们中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 立刻与实践相关, 也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羞愧。

于是, 很多人认为, 批评一篇文章或者指出它的缺乏影响来讲, 比起发现并欣赏一系列研究的价值更为重要 (Lee, 2009)。Angelo DeNisi (2009) 在 2009 年 8 月美国管理学会 (AOM) 的主席致词中讲道:

“你曾读过 Kahneman (和 Tversky 以及他们的同事) 所指导的一项研究吗? 这个研究是让 80

^① 在这个领域, 我们也不清楚为何某些文章具有高度的学术相关性。即便被频繁引用的文章作者在撰写和发表文章的时候, 也不能预测他们是否能被高度引用 (Peng, Zhou, 2006)。

^② 本文的第一作者和两位同事 (Seung-Hyun Lee 和 Yasuhiro Yamakawa) 经历过这种惊喜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2008)。2007 年 6 月, 我们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柏森商学院创业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Lee, Yamakawa, Peng, 2007) 得到了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授予的最佳论文奖, 因其“探索了小企业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或者对创业社区至关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颁奖词)。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联邦政府机构有这样一项与实践和政策相关的奖项。

个本科生去假设他们正在为一个小学管理投资组合。学生们可以将钱分配于两个投资之一。其中一个投资是基于平均收益的债券基金。学生们做出了 12、25 或 40 的分配决定，每个决定都会收到反馈，然后被要求做出一个最终的长期分配决策。”

“对于我来说，这看起来很‘不切实际’……这篇文章发表在 1979 年的经济学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如果一个人仅仅关注这项研究，就很容易发现为什么有人批评它……这篇文章直至 2009 年仅仅被引用了 72 次。但是，这仅仅是一项更大的研究项目中的一个研究成果。2009 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这项研究和其他一些类似研究的结果，即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这篇文章发表在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a) ……已经被引用了 5292 次。”

如果建立了“我们的学术要立刻体现相关性”那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就可能忽视我们对实践所做出的某些最有价值的贡献。除此之外，Pfeffer 和 Fong (2002) 还责备我们的学术没有体现在畅销的商业书籍里。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传播我们的研究，从而对管理者产生价值。例如，我们可以听从 Beyer 和 Trice 的建议，“注意通过教科书和我们自己的教学活动向未来潜在使用者传播我们的研究” (1982)。《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 和《从优秀走向卓越》(Good to Great) 的作者 Jim Collins 很难说是第一个维护教学活动的人。他说“不要试图想出正确的答案，重点是提出好的问题” (2009)。同样，Murray Davis 认为，“有趣的”理论是那些“否定听众某些假设的理论” (1971)。换句话说，学术不能提供可以迅速被应用的规范性理论 (Lee, 2009)。但是，它可以帮助管理者构建问题框架，提出正确的问题，并质疑他们的基本假设 (Bazerman, 2002)。

让我们回到论点，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在另一个行业 (医药) 里，人们由于没有严厉地质疑自己所提出的假设，结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Benjamin Rush 大夫是一个备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美国第一所医学院的教授，独立宣言的签名人之一 (Davis, Hogarth, 1992)。他提倡放血疗法，并付诸实践，治疗发热性疾病。他相信热病是血液受到过多的刺激而兴奋的缘故。当 Rush 患了黄热病时，他给自己放了大量的血。正如 Eisenberg (1977) 所述：

“从疾病和治疗结合的角度来看，他几乎死了。然而，他的康复期延长了，他的确恢复了。这使他认为他的方法是正确的。他这样做，既不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以拯救别人的伟大奉献精神，也不是像治疗别人一样自愿地治疗自己，更不是 Rush 在那个年代所受到的最好教育可以阻止他以好的名义做严重伤害的事。他相信自己的医术理论是正确的，由于缺乏系统研究医疗结果的手段，所以，他将每一次病情的改善归功于自己有效的治疗，而将死亡认作是疾病太严重的结果。”

诚然，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但我们确信，我们中的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实践者。这些人他们依赖并且强化自己对如何完成某件事所提出的假设。这样的偏见，会导致像 Rush 医生这样的人有选择地寻求那些能够支持他们理念的信息。这会使他们看不清现实，并阻碍学习。正如 Whittington (1993) 所说：

“说到我们行为的基础，Argyris (1977) 称这种假设为‘行动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危险是正在忘记我们已经拥有它们。正如 Keynes (1936) 指出的，那些自诩具有管理常识方法的人，很可能正在遵循着他们早期职业生涯灌输给他们的那些不完善的，记忆不清的伪科学。总结他对美国高层主管的研究，Argyris (1977) 警告说，没有什么比让假设一直藏而不露更危险。除非我们让内含的‘行动的理论’浮出水面，否则我们就无法检测它们的准确性，也无法按当时的状况修正它们。那些不积极面对他们内在假设的人，是注定要成为‘他们自身理论的俘虏’。” (Argyris, 1977)

众所周知，在 AMJ 这样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一个要求就是对理论做出贡献。因此，就必须不断地质疑、重新评估与更新我们的理论基础。顶级期刊与很多实践性期刊不同，常常发生这种苛求。在很多情况下，实践性期刊持续接受既没有经过实证检验也没有理论检验的规范性理论。

换句话说，他们经常用一个实例来归纳理论。因此，针对 Pfeffer 和 Fong (2002) 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难道管理者所阅读的文章就一定是要最有价值吗？或者，对于学者来说，我们宁可“不相关”，也不要肤浅。这难道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吗？

在高管教学中，那些有经验的学生经常告诉我们，参与严格的理论争论有助于管理者检视自己的假设，从而在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情况下，提升他们开拓 Weick (1979) 所说的“复杂理解”的能力。例如，考虑运用辩证调查这类决策技巧 (Schweiger, Sandberg, Rechner, 1989)。这就需要用两个可替代的观点来解决一个问题。其目的是评论两个对立观点中的任何一个（命题与反命题），最后形成一个创造性的综合。如果管理者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假设，不想开拓“复杂的理解”，就会使得本来有见解的决策技巧变得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

因此，当对评价我们的学术对实践者的潜在价值时，我们不能考虑“在大众传媒中流行”的观念。大众传媒的目标，简单讲就是卖书和杂志，增加出版商的盈利。我们都很熟悉那些所谓的机场书籍。他们适合在短途飞行中阅读，可以使读者快速理解。说到这，大家就会想到《一分钟经理人》(The One Minute Manager)。同时，作为学者，我们的角色是发展与检验好的理论，而不是与《一分钟经理人》那样的书进行竞争。根据 Baldrige 等 (2004)、Daft 和 Lewin (2008) 的观点，如果我们的描述性理论是好的话，终有一天，有用的规范性理论也会进化。

三、学术与学术竞争

除了对所谓的“不相关”提出批评以外，另一大类的批评就是针对学术竞争以及根据发表文章多少为依据的排名。在 (非常准确地) 指出一系列排名的缺点以后，Adler 和 Harzing (2009) 认为按照发表文章多少来排名是“不健全的”，“胡说”的；Giacalone (2009) 认为这些排名代表了“专业健忘症”；Macdonald 和 Kam (2007) 则嘲笑这是“以诈取胜”。在赢得以发表文章为基础的学术竞争后，Hambrick (2007) 将我们对严格理论的追求称为“恋物癖”，而 Pfeffer (2007) 说我们的学术竞争是“令人沮丧的”。特别是，我们要大力反驳下面三种批评：

1. 挑选“A”类杂志的武断

某些顶级期刊的名单挑选总是简单武断的。没有入选的期刊，都被认为是质量低，没有可选性。按照所谓武断的标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FT) 排出的前 40 名期刊，达拉斯德州大学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TD) 排出的前 24 名期刊，Xu、Yalcinkaya 和 Seggie (2008b) 通过分析提出前 6 名国际商务期刊等都可以因此受到批评 (Harzing, 2008; Xu, Yalcinkaya, Seggie, 2008)。Adler 和 Harzing (2009) 建议衡量高水准的学术，可以采用更多的途径，如书籍、论文集、在线出版物和其他期刊等。问题是在哪里划线，界定标准呢？英国商学院协会目前有一份包括 1040 种期刊的名单。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在这个由 35 个管理系编定名单上，有 1008 个出处 (Van Fleet, McWilliams, Siegel, 2000)。不过，这些清单上只有学术期刊，不包括 Adler 和 Harzing (2009) 所支持的非学术期刊。要处理这些众多的信息，就需要跟踪与解释各种来源的信息。但是过长的名单使得信息处理变得不切实际了。

期刊要做到“A”榜有名，实属难上加难。但是，任何学校都能轻而易举地实施这个名单。最近，阿肯萨斯大学的 Worrell 院长 (2009) 讲了一个笑话：“院长可能对研究知之不多，但是他至少会数数。”批评者们认为，这种简单的数豆子的方式说明在对教师研究的评估上有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即院长和资深同事们不再认真地阅读申请者的论文了 (Adler Harzing, 2009; Giacalone, 2009)。不过，假定管理学科范式发展水平低，评审人员在一篇文章上会反复出现不一致意见。这样，院长和资深同事出于使申请者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的目的，就要认真阅读和评价申请者的每篇文章。通常这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章，耗时耗力，还有没完没了的不同意见与政治上的争论

(Van Fleet 等, 2000)。^① 总之, 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毫不奇怪, 院长、资深同事以及大学行政管理者们认为相对简短且被广泛接受的“A”类名单是解决界定最优学术成果中这一棘手问题的最佳方法。这样一份清单虽然不够完美, 但是能够抑制一些党派行为、人为争端和投机取巧。从某种程度上说, 盲评法与院长和资深同事一起阅读的方法恰恰相反。它不仅根据学术本身的质量, 还根据评价和判断该学术价值方法的质量, 从而对正在申请终身教职的教师起到保护作用。

下面继续将我们的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做类比。批评者会批评奥林匹克没有包括某些流行运动, 例如, 美式足球、蹦极、高尔夫、扔马蹄铁、功夫以及摩托车等。为什么奥运会不能包括更多的项目呢? 在这点上, 与评职称时可看期刊文章信息有限的原因一样, 要求一个平时不比赛时就很拥挤的城市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举办奥运会, 其所能开展的比赛项目会受到财务、物质和基础设施等限制。2008 年 8 月, 北京奥运会一共进行了 28 项比赛; 2010 年 2 月, 在温哥华有 15 项比赛。伦敦即使不举办 2012 年奥运会, 不是也已经很拥挤了吗? 拥护者们认为评审时应当阅读期刊论文, 而不是数在“A”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事实上, 这是建议各国分发现金奖励的体育官员, 以及通过签署诱人协议雇用奥运明星的俱乐部高管们, (在现场或者通过电视) 观看每一场比赛, 去评估谁真正是世界级的运动员, 而不是简单地凭借选手们所取得奖牌来评价。毫无疑问, 有的官员和主管会这样做。谁不想看一两场奥运会比赛呢? 但是, 要让这些忙人观看每一场奥运会比赛是不现实的。同样, 我们认为院长和资深同事可以选择性地阅读晋职申请者的一些成果(这些论文的副本都附在申请上)。但是, 他们不可能阅读申请者所有的论文。

2. 研究排名缺乏稳定性

研究排名显示了不稳定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学者和学校排名上升了, 另一些则下降了。Adler 和 Harzing (2009) 说, “如此强烈的不稳定性让我们质疑这些排名到底有多大意义”。Adler 和 Harzing (2009) 认为, 既然一个世界级的学者可以让一所学校突然进入排行榜的最前面, 而这样的学者又经常更换学校, 那么, “说得好听点, 机构的排名是不稳定的; 说得不好听点, 就是这个排名毫无意义”。我们认为, 就像财富 500 强的名单一样, 每年都会有新的企业列入, 也会有企业出局。研究排名的不稳定性正是说明这个领域充满活力。产业组织研究早就证实这一点, “即使是领先企业的市场份额也存在相当大的反复”(Davies, Geroski, 1997)。战略研究也用“超竞争”概念, 阐述竞争优势会被快速侵蚀 (D’Aveni, 2002)。随着商学院在世界范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Leung, 2007; Mudambi, Peng, Weng, 2008), 研究排名所显示出的不稳定性难道值得吃惊吗?

当然, 以发表文章为依据的研究排名并不代表一切。久而久之, 它们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Jain Golosinski, 2008)。依据达拉斯德州大学 (UTD) 数据库中的数据, 我们按照最早的年份 (1990), 最近 5 年 (2005~2009) 和最大的跨度 (1990~2009) 三个时间段, 查出排名前 100 名的学校。可以看出, 这里面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变化, 学者、学校、筹资机构、州政府和教育部门才如此关注这样的排名。即使是表现很好的学校也要更具有竞争力, 以免其他学校在下一年赶超上来。^② 在如今透明扁平的学术界里, 只停留在历史的荣耀中是一种很危险的战略。在现实中, 前 24 期刊的新排名一旦发表, UTD 就持续更新排名。

我们的学术竞争再次与奥运奖牌统计有了明显的相似性。追求奥运奖牌数不仅显示出运动的

① 一些与申请人学术领域不同的院长可能不能完全胜任, 去评判这些同事的学术水平。如果一个战略领域的教授成了院长, 并且他或她愿意阅读并评价一位财务领域的教员发表的所有论文 (如果这位院长之前并没有读过财务方面的文章), 我们又能给这位院长的读后评价多大权重呢?

② 在支持学校改善排名或潜在失去阵地上, 共同演化的过程里的研究相关性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商界, 红皇后效应体现在每个企业绩效的竞争上。这取决于赶上或者超过竞争对手的行动上 (Derfus, Maggitti, Grimm, Smith, 2008)。Baumol (2004) 认为红皇后效应是驱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机制。

魅力，也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宏愿和能力。如美国长期的优势，冷战期间的苏联和东德的挑战，1988年首尔奥运会后韩国的兴起（如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排名第七的佳绩），还有最近中国的兴起（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二的成绩，温哥华冬奥会上排名第八）。Adler 和 Harzing (2009) 曾批评研究排名不稳定，因此这种排名没有意义。我们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学术的排名与奥运会排名正是因为它的不稳定，才更具有丰富信息且意义重大。如果研究排名是稳定的，谁还会关注新排名呢？但是，这些排名是不稳定的。^①

3. 研究排名引发的竞争行为

根据批评者们的说法，研究排名抑制了好的学术，使得人们以忽视解释重要问题为代价，只想在“A”类期刊发表文章。Adler 和 Harzing (2009)，Giacalone (2009) 对这一行为发表评论道：

“这是一种只重视成功、地位、权利和金钱的心态。这是一种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秀的霸权心态。这是最悲哀的竞争……教师和管理者都在努力取得成功——都在努力有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希望自己比他人更优秀，希望有自豪感和成就感。”

除了不能同意“悲哀”这个词以外，我们认为这是对学术竞争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但是，我们真的很困惑：“努力成功”有什么不对呢？“努力创造一个欣欣向荣事业”有什么不对呢？“希望有自豪感和成就感”又有什么不对呢？Giacalone (2009) 可能不知道他的话对追求卓越的奥运会选手（和其他运动员）也是非常准确的形容。

我们应该为我们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感到骄傲，而不是为我们的竞争行为感到羞愧。

我们选择通过在“A”类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方式来进行学术竞争，不是因为这很简单，而是因为这很难。^②

我们的投稿都曾被拒过。但是别忘了：在北京奥运会的 11028 名选手中，只设立 958 枚奖牌（302 枚金牌、303 枚银牌、353 枚铜牌，包括个人的和团体的赛事）。同样，参加温哥华比赛的 2622 名运动员，也只能竞争 258 枚奖牌（86 枚金牌、87 枚银牌、85 枚铜牌）。大部分的运动员不能获得奖牌。他们是感到沮丧难过，还是兴奋高兴呢？不管输赢，他们都会哭泣、尖叫、踢脚。我们推测，在他们内心深处，不管有没有得到奖牌，奥运选手都很感激有机会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赛。挥洒了那么多的汗水和泪水，这些运动员配得上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所有掌声和喝彩。记住，所有奥运选手，即使是没有获得奖牌的选手，都是他们国家最好的运动员，是在国家级的比赛中从更多的运动员中选拔出来的。因此，奥运比赛不仅激励着选手本身，也激励着其他运动员和想要成为运动员的人（也包括商界和学术领域的非运动员）。

很明显，将篮球投进篮筐的能力，在速滑比赛中超过其他人的能力，或者剑术比赛中用古代的剑击刺别人的能力，与现实世界并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奥林匹克精神中的专注、训练和追求卓越，本身就是光荣的（并且令人敬畏）。正是为着这个原因，全人类——不分年龄、文化和政治见解——都被这项两年一次的赛事吸引着（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每两年轮流举办）。

把学者看成学术界的奥林匹克选手，并不是牵强附会。奥林匹克选手是根据其优秀的运动能力，从众多运动员中选拔出来的。学者们被选入博士项目，也是由于他们学术卓越。博士生确实代表着少数“精英”。在美国，350 个本科生和硕士生竞争一个管理学博士学位（AACSB, 2008）。学者们之所以被学校聘用为教师，也是因为他们致力于学术，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具有在 A 类期刊发表论文的潜力，就像奥运选手得奖的潜力一样。为了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我们必须赢得奖

^① 注意，我们指的是通常基于实际绩效（类似于奥运奖牌数）的研究排名。相比之下，MBA 排名通常基于感觉而且相对稳定（Moregeson, Nahrgang, 2008）。

^②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宣布了 10 年后人类登月的目标后，同样也有批评者争论这个尝试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或者“有意义”。

牌回家（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奥运会有全球的电视转播。相比之下，我们所运行的学术界则相对模糊不清。毕竟，看奥运会赛事的人要远远大于参加学术会议或阅读学术期刊的人。^①但是，我们不同意 Giacalone（2009）的说法，即“在多是学者们阅读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甚至在美国管理学会和它的 18000 名成员这样颇受尊敬的团体，都很难使任何人成名”。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为在 AMLE 上发表这篇文章所获得的小小名誉而高兴。分布在 100 多个国家的 18000 多名美国管理学会会员以及成千上万的图书馆和数据库都会看到这篇文章。我们对于学术界的奥运选手的建议是：不要沮丧，参加比赛，竭尽全力，迸发智慧。享受你获得的每个（小）成就。每一篇发表的文章都像是一枚珍贵的奥运奖牌！

在这种情况下，Adler 和 Harzing（2009）建议中止学术排名是不切实际的。无端地改变游戏规则，对那些终生奉献于理解规则，并努力追求卓越的学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教授学生们积极地参加商业竞争；另一方面却又躲避学术竞争，就会破坏我们的专业声誉，让我们显得更加不相关。如果我们自己努力争取优秀，也许我们更有资格要求学生做到优秀。由于结果相对透明（就像数奖牌），学术竞争使学术界更任人唯贤（Miller, Glick, Cardinal, 2005）。否则，学术界将被政治、平庸和保护主义所湮没。“达到顶级学术期刊的严苛的同行评审标准确实很难。如果不必达到这些标准，生活肯定会很容易。”（DeAngelo, 2005）

我们将以一个关于教师职业兴趣的讨论来结束这部分内容。这也是被反复批评的靶子（Adler, Harzing, 2009; Bennis, O'Toole, 2005; Ghoshal, 2005; Giacalone, 2009; McGrath, 2007; Pfeffer, 2007）。根据 Giacalone（2009）等的批评，教师的职业兴趣如果寻求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更多的文章，最终转化成为权力、金钱和声望，将是一件坏事。出于对纯学术的兴趣，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自愿（没有报酬）地进行潜心研究，尽管重要期刊的退稿率高达 90% 以上。除了我们本身的学术兴趣以外，我们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包括以上两位批评者）都愿意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回报学校提供的激励。这种激励一方面奖励我们成功；另一方面使我们得以养家糊口。长期以来，制度学者们一致认为个人和团体都对激励模式等游戏规则做出反应（Peng, Sun, Pinkham, Chen, 2009）。这有什么错吗？追溯到 1776 年，难道亚当·斯密没有告诉我们，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合法性上的一致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难道 Simon, March 和 Cyert 没有教会我们，个人职业兴趣和组织兴趣的一致有利于达成组织的目标？更好的学术能够带来更显赫的机构声望。这一声望吸引着更优秀的学生，服务于我们的学校，使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加有益（AACSB, 2008; Becker 等, 2003）。学术研究对 MBA 年薪的直接影响估计在 750 美金（Mitra, Golder, 2008）~24000 美金（O'Brien 等）。除了更易测算的 MBA 工资，我们相信学术研究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创造了价值。

就像奥林匹克选手力夺奖牌不仅给自己也给国家带来荣耀一样，我们对在“A”类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兴趣既可以帮助自己，也对学校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益。因此，这样的兴趣应该被支持，被提倡，被庆祝，而不是感到羞愧。批评者们真的希望看到一大群对提升学术没有兴趣的管理学者吗？

四、讨 论

大多数管理学者不是拥有博士学位，就是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博

^① 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一些知名度高的运动，也有一些相对难以理解的奥运项目（比如夏季奥运会中的花样游泳、马术和帆船，冬季奥运会中的冰壶和无舵雪车）。这些运动仅在小部分人群里流行。但是，仍有大量观众有兴趣关注其顶尖的选手。

士是哲学的最高学位。因此，我们应该哲学化，尤其是在处理像管理学术的本质和意义这样重要问题时。这些问题对我们的专业界定与自我实现都很重要（Mitchell，2007；Tjosvold，2008）。2008年管理学会主席 Thomas Lee 在他的主席演讲中说道：“公正地说，大部分学会会员确信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Lee，2009）。2009年的学会主席 Angelo DeNisi 在他的主席演讲中更加开诚布公：“我对那些说我们的研究缺乏相关性的批评和攻击感到厌烦”（DeNisi，2009）。^①但是，在针对学术不相关的批评面前，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只有少数人站出来辩护。受到 Rajan 和 Zingales（2003）对资本主义研究与 Peng（2004）对国际贸易研究辩护的鼓舞，我们通过这篇文章，用最清楚的观点来维护和推进学术精神。“毫无疑问，商学院和其教师们通过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创造价值，在商界和社会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ACSB，2008）

总的来说，认为管理学术缺少相关性就批评它有缺陷，可能反映出普遍没有认识到学术的本质（Kieser，Leiner，2009；March，Reed，2000）。几千年以前，第一代学者把自己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开辟了骄傲的学术传统。从那时起，学者们就一直因为缺少相关性而受到批评。20世纪的管理学者，只不过是受到这种批评的新一代学者。^②没有证据说，与实践紧密相连的学术就是更好的学术。

有两个“实践应用”和学者紧密相关。首先，我们应该为我们学术的科学严谨性和客观性感到骄傲，而不是为其所谓的缺乏相关性感到歉疚。我们不需要将商学院再变回 1950 年代职业培训学院的模式。这一模式已经被抛弃（DeAngelo 等，2005）。“束缚于相关性，就会有失去我们独立性的危险”（Knights，2008）。这并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做到不相关性。只有少数管理学者不关心实践（Walsh 等，2007）。我们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培训，说明了我们为做到相关性而付出积极的努力。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当我们的学术被指责为不相关的时候，我们不当为此失去自信。与实践者和短期管理解决方案的咨询者进行竞争，既不是我们的强项，也不是我们喜欢做的事（Kieser，Leiner，2009；Lee，2009；March，Reed，2000）。

管理学者也不必有自卑情绪。社会科学经常遭受“物理嫉妒”。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羡慕”的现象很猖獗。现在，Pfeffer 和 Fong（2004）想让商学院嫉妒其他专业学院，例如工程设计、法律、医药、教育等学院。这种自卑感莫名其妙。在很多大学，商学院是其他学院的嫉妒对象。本科生经常退出他们本来的主修专业，加入到我们的项目。不论是在衰退期前、后，还是衰退期中，MBA 注册人数持续高涨。最好的社会科学的学生涌入到我们的博士项目。很多其他系（比如经济系）和其他学院（比如工程设计学院）的博士生私下联系我们，内心想放弃原来的专业。工程设计的教师们想和我们建立合作项目，以让自己显得“有相关性”。其他社会科学的教师把获得到商学院的聘请看作一件幸运的事。例如，最近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因其教师中有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引以为豪。这一数字超过了现仍留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四名诺奖获得者（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正在计划离开）。我们可以继续，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让我们自信一些，为我们的学术而骄傲（Markoczy，Deeds，2009），让别人“嫉妒商学院”。

其次，我们应当保护、支持与强化学术竞争，而不是批评它。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游戏”仍然在全球范围开展。澳大利亚、英国、中国、新加坡、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学院，正在自动放弃当地定义的优秀期刊标准，转而采用全球标准的“A”级期刊名单，如“金融时报”和 UTD。批评者可能不喜欢“A”级名单，但它的传播是无可争辩的。这就像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推广一样。参加比赛的国家和运动员越多，赢得奥运奖牌的机会就越难。同样，很多国家都认识到，在“A”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质量要求要比以前难得多（Certo，Sirmon，Brymer）。

① 在此次演讲中，DeNisi（2009）也提到，我们人文学科的同事常常批评管理知识太相关。我们对此批评不予评论。

② 我们可以幽默或者嘲讽地说，这些批评是承认我们是真正的学者，承认管理学已进入一门成熟学科的年代。

在这种情况下，卓越是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成功是世界级的，奖励是合理的。

就像运动员会退役一样，一些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某一时刻会做出选择，退出发表文章的竞赛。尽管如此，在面对新出现的学术时，他们应该“支持、赞美，做它的发言人”（Walsh 等，2007），而不是加入信息不足的非学者队伍，去质疑它的价值和相关性。很多退役的奥运选手会继续为新的选手喝彩。当一些以前的奥运选手批评奥运会的政治性时，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公开地控告奥运比赛本身是“不相关”或“没意义”的。想象一下，如果退役的奥运选手如此评价他们曾经热爱的运动，会令正在努力的奥运选手们感到多么沮丧。

1988 年，商业周刊（BusinessWeek，BW）在媒体上第一次公布商学院排名之后，许多学者和学校抱怨商业周刊完全忽略研究的粗俗排名方法（DeAngelo 等，2005）。Trieschmann, Dennis, Northcraft 和 Niemi（2000）发现媒体排名和研究排名基本没有关系。最近，商业周刊排名将研究考虑进去，但是权重很轻，研究实际上还是被忽视了（Morgeson, Nahrgang, 2008）。对媒体排名感觉失望的学者们，呼吁创建专注于研究的排名（DeAngelo 等，2005；Gioia, Corley, 2002；Morgeson, Nahrgang, 2008）。^①

作为对这种呼吁的响应，UTD（<http://top100.utdallas.edu>）排名在 2005 年产生了。UTD 的排名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它可以对任何年份（从 1990 年开始）、期刊、学校和作者进行检索。UTD 的排名，填补了具体的、有据可依的研究排名的空缺。现在，UTD 排名目录被广泛地接受（在 UTD 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学校也被列入学院的招聘材料中）。不幸的是，当早期学者提倡的透明、实时、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排名终于出现，以学术方式应对“粗俗的”媒体排名的时候，管理学者却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评。

最后，我们需要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在对管理学者提倡“唯有研究”（或“唯有 A 清单”）的使命。我们同意 O'Brien 等人的观点，不顾教学而进行“过多的”研究活动，会逐渐减少甚至形成负的收入回报。大多数管理学会会员并不在“研究型院校”中工作。然而，我们相信学术精神对这些学校中的管理学者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奥林匹克运动是全球性的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大国和种子选手的比赛。我们的学术竞争也不是为研究型院校和顶级学者而存在，是为每一个全力以赴的管理学者而存在的。

五、结 论

管理学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创造与传播关于管理和组织的学术知识。我们努力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以推动学术竞争，促进创造与扩散。第一所以大学为依托的商学院（沃顿）始建于 1881 年，但是到了 1950 年代才兴起以研究为主的商学院。Khurana（2007）仔细记载了早期管理学者不顾那个时代的批评（如缺乏系统性和相关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后一代的我们，都从中获得收益。为了不忘记开拓者们所经历的艰难，我们相信我们都承担着“不断提高学术价值和可见性”这一神圣使命（AACSB，2008）。我们相信持续消极，会适得其反，且会有潜在危害。想象一下，如果一些批评者对管理学术所做的致命攻击，出现在那些试图削减大学预算的政客和立法者的书桌上时，会发生什么？

最新一轮对管理学术的批评既不是首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最近这些批评似乎有所升温。我们中那些珍视学术，致力于发展、加强、提倡学术精神的人需要来应对每一轮新的批评。

^① 可以假定排名很大程度上是为潜在的学生设计的。像其他组织一样，商学院为各种顾客服务。就排名来说，本科生和 MBA 学生关心的并不仅是研究。博士会关心研究的排名。如此一来，承认各种排名的价值，而且不轻视这些排名，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注意到，那些与我们产生分歧的批评者们同样也是管理学者。所以，我们相信他们和我们都对提高管理学术有着同样的兴趣。

最后，我们要指出，商学院价值主张的关键是：要基于学术和教学的事实（Briner, Denyer, Rousseau, 2009）。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万能药。但是，我们中大多数人会同意，这种受学术精神驱动的方法要好于管理者们为他们遇到的每一个挑战所开的处方。

六、致 谢

感谢 Ben Arbaugh (AMLE 编辑), Jonathan Doh (模范贡献编辑), 以及我们的评审人的编辑指导和支持。同时, 感谢 Dave Ahlstrom, Ashiq Ali, Shawn Carraher, Christine Chan, Harry DeAngelo, Julie Hayworth, Mike Hitt, Varghese Jacob, Ben Kedia, Sumit Kundu, Kenneth Law, John Lin, Livia Markoczy, Agnes Peng, Hasan Pirkul, Mike Pustay, Suresh Sethi, Venkat Subramanian, McClain Watson, C. S. Wong, Dean Xu, Attila Yaprak, Michael Young, Frank Yu, 以及 Kevin Zhou, 感谢他们富有帮助的讨论。我们也要感谢 Angelo DeNisi 发给我们他的主席致词, 以及 Grace Peng, Weichieh Su 和 David Weng 的尽力协助。我们在达拉斯德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就早期的版本做过演讲。这篇文章同时又是两位作者在西南管理学院 (达拉斯, 2010) 接受杰出学者奖时演讲内容的一部分。本研究受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CAREER SES 0552089), 常务副校长杰出教授奖金, 以及安德鲁塞西尔讲座教授基金的部分资助。我们感谢 Hasan Pirkul 院长允许我们使用 UTD 前 100 家商学院研究排名的数据。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1] AACSB. Final report of AACSB Impact of Research Task Force [J]. Tampa, FL: AACSB, 2008
- [2] Adler, N. J., Harzing, A.-W. When Knowledge Wins: Transcending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Academic Ranking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09, 8 (1): 72-95
- [3] Agarwal, R., Hoetker, G. A Faustian Bargain? The Growth of Manag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lated Disciplin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 1304-1322
- [4] Argyris, C. A. Double Loop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77, 55 (5): 115-125
- [5] Baldridge, D. C., Floyd, S. W., Markoczy, L. Are Managers from Mars and Academicians from Venu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Quality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25: 1063-1074
- [6] Baumol, W. J. Red-queen Games: Arms Races, Rule of Law, and Market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4, 14: 237-247
- [7] Bazerman, M. H. Judgment in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J], 5th ed. New York: Wiley, 2002
- [8] Becker, E., Lindsay, C. M., Grizzle, G. The Derived Demand for Faculty Research [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03, 24: 549-567
- [9] Bennis, W. G., O'Toole, J. 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3 (5): 96-104.
- [10] Beyer, J., Trice, H. The Utilization Proces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he Synthesis of Empirical Finding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27: 591-622
- [11] Briner, R. B., Denyer, D., Rousseau, D. M.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Concept Cleanup tim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23 (4): 19-32
- [12] Certo, S. T., Sirmon, D., Brymer, R. In Press. Competition and Scholarly Productivity in Management: Investigating Changes in Scholarship from 1988 to 2008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 [13] Collins, J. How the mighty fall [J]. Business Week. 2009, May 25: 27